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西北边疆民族史地论集

蔡家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因此，有关各民族的历史，一向为历代学者所关注。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以往学者对边疆各民族历史的研究，大多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各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往来关系上，而对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情况，则鲜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偶尔见之，大都亦只有寥寥数语，令人如坠五里雾。这种现象，及至近代以后，始有较大改变。

对边疆各民族历史的研究有较大突破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得解放而取得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国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又将其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民族，都有人在进行辛勤耕耘，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从事边疆民族史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是中华民族历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与西北边疆民族史结缘，始于1975年参加翁独健先生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组成的《准噶尔史略》编写组。成立该组的目的，原是想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打破当时准噶尔史研究中的某些禁区。因此，编写组一建立，便经常同全国各有关学术机构联系，征求其意见并进行交流，从而使我对西北边疆民族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决心努力为之奋斗。尔后不久，由于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共同承担的全国“七五”重点项目《中国民族史》（王锺翰先生任主编）、民族所田继周等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八卷本）、卢勋等承担的全国“八五”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等相继启动，我先后应邀为上述各项目组成员，分别负责匈奴、沙陀、回纥、党项、吐浑、蒙古、回回、汉等族历史的撰稿任务；积极参与《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两书的撰写并兼任副主编。与此同时，还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局支持下，又完成了《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专著，200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局优秀成果二等奖）及十余篇学术论文。这里所选论文，即为前述论文中的一部分。内容涵盖沙陀、蒙古、回、藏、哈、维等族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情况，其中又以有关卫拉特蒙古史方面居多。

这些论文因在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而各刊物对所载论文体例一向有不同要求，因此，此次所选文章体例，都进行了统一处理，内容提要及作者简介全部删去，注释俱改为页下注。个别有重复或提法不甚贴切的地方则进行了删节与修改。《策妄阿喇布坦功过评述》一文为作者与范玉梅（已逝）合撰。

边疆民族史研究是一门难度较大的综合性学科。西北边疆各民族因长期居住于西北边陲，其语言、文字、宗教、习俗等与中原内地各族人民大都有较大区别，故要了解其历史，除要有较好的史学基础外，还要具有相应的语言学、地理学、宗教学以及民族学方面的知识，否则，许多问题便难以解决。学术界的良师益友如马曼丽、马大正、成崇德、郭蕴华、冯锡时、刘汉明等诸先生，都曾在不同范围内，热情地为我提供过帮助，在此特致以衷心的感谢！与此同时，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张林女士为本书的校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与帮助。

妻杨亚为保护我的健康，论文从复制、录入到修改，俱为她亲自操办，予我以巨大支持。

因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勿吝赐教。

2014年8月2日于北京海淀芙蓉里

目 录

| | |
|----------------------------|-------|
| 沙陀族历史杂探 | (1) |
| 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 | (17) |
| 12—17 世纪初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述略 | (31) |
| 关于明朝辖境内的蒙古人 | (48) |
| 从明英宗被俘至归京看也先 | (66) |
| 试论回回民族对汉文化的吸收和影响 | (75) |
| 清代蒙古族的封建等级 | (89) |
| 噶尔丹与五世达赖关系刍探 | (116) |
| 策妄阿喇布坦与噶尔丹交恶缘起与发展考论 | (128) |
| 策妄阿喇布坦功过评述 | (143) |
| 简论噶尔丹策零 | (156) |
| 罗卜藏舒努生平事迹辑探 | (168) |
| 拉藏汗刍议 | (180) |
| 土尔扈特东返经由何路进入沙喇伯勒 | (189) |
| 清代西北边疆民族史研究三题 | (198) |
| 准噶尔的畜牧业 | |
| ——准噶尔社会经济初探之一 | (207) |
| 准噶尔的农业 | |
| ——准噶尔社会经济初探之二 | (222) |
| 准噶尔汗国时期新疆的手工业生产管窥 | (245) |
| 清代前期准噶尔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关系 | (258) |
| 18 世纪前期准哈关系述论 | (295) |

| | |
|----------------------|-------|
| 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 | (306) |
| 清代新疆茶务发展述略 | (320) |
| 清代新疆玉石的开采与输出 | (339) |

沙陀族历史杂探

随着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研究的深入，有关沙陀族历史，目前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史料流失较多，现存记载又很不完整，有的甚至谬误迭出，导致不少问题至今仍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回答。以非为是、以偏概全的现象也时有所见。笔者以为从事历史研究，先得弄清历史事实，否则便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 唐初西域有沙陀都督府吗？

关于唐初西域有无沙陀都督府问题，我国学者目前大都持肯定态度。例如，郭平梁在《阿史那忠在西域》一文中就说：“永徽初年（650），庭州刺史骆宏义曾建议发动射脾、处月、处密契苾等部讨伐阿史那贺鲁叛唐，派处月、处密等部攻打庭州，被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人打败。第二年，唐朝在处月地方设置金满、沙陀二州。”^①薛宗正的《突厥史》说：653年（永徽四年），“是年颉苾达度设建号真珠叶护可汗，起兵攻阿史那贺鲁，遣使通唐约求合攻。唐朝抓住这一有利的出师良机，遂于‘五月，遣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伊州都督苏海政等，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此役唯一重大的收获乃创建了金满、沙陀二羁縻州，这是唐朝对西突厥降部实施行政改编的最早记录”。^②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根据《新唐书·沙陀传》引出的结论。因为该书明确地说在永徽初年，唐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

^① 引自《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185页。

^②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

州，皆领都督”。^①也有的学者根据《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的记载，说唐朝在贞观年间平薛延陀后，即于处月部所在地设置了“沙陀都督府”。例如，韩国磐在其《隋唐五代史纲》中说：“沙陀源出西突厥别部，或即同罗、仆固之后。唐太宗平薛延陀，迁同罗、仆固部民置沙陀都督府，该地有沙碛名沙陀，因以为名。”^②徐庭云《晚唐五代时的沙陀》说：《旧五代史》称太宗“平薛延陀诸部，分同罗、仆骨之人，于安西、北庭地区置沙陀都督府，这一点是合乎当时历史情况的”。^③还有的学者认为：“《旧五代史》的说法虽有夸大成分（如置府之说），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据我们研究，沙陀都督府即是金满州都督府，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内涵一也”。^④

关于沙陀都督府问题，我以为纯属子虚乌有。主要根据如下：

有关《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中的记载，早在宋代就受到欧阳修的质疑与批驳了。他在《新五代史·庄宗纪上》末尾明确指出，所谓当唐太宗时破西突厥部，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⑤我以为欧阳修的说法是正确的。据王溥《唐会要》记载，唐太宗平薛延陀事在贞观二十年（646）。史载：“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顿，铁勒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人’”，请求“归命天子”“置汉官司”。在铁勒诸部的强烈要求下，当年十一月，“太宗至灵州，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诸姓至灵州数千人，咸请列其地为州县”。^⑥次年，诸部首领复至长安朝觐。唐太宗为满足诸部要求，遂“以回纥部为瀚海，多滥葛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为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以浑为皋兰州，斛萨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羽为榆溪州，奚结为鸡

① 《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②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5页。

③ 徐庭云：《晚唐五代时的沙陀》，《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④ 张云：《沙陀早期历史初探》，《西北历史研究》（1989年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新五代史》卷4《庄宗纪上》。

⑥ 《唐会要》卷96《铁勒传》。

鹿州，思结别部为蹄林州，白霁为寘颜州”。^① 以上所列，就是欧阳修所说的“十三州”。在这些都督府州中，根本没有“沙陀都督府”踪影。在唐代其他重要史籍中，也未见有关于“沙陀都督府”的记载。因此，所谓“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新唐书·沙陀传》说唐王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的说法，在该书的同一传记中，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例如，书中说：“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金山死，子辅国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复领金满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为郾国夫人。辅国累爵永寿郡王。死，子骨咄支嗣。”^② 以上记载说明，从沙陀金山至骨咄支，其祖孙数代皆为金满州都督，而对“沙陀州都督”则只字不提。如果在金满州都督府附近真的还有一个“沙陀都督府”的话，书中绝不会无所表示。《新唐书·地理志》中虽然也有“沙陀都督府”一名，但该《志》在述及“金满州都督府”时下注：“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③ 但在提到“沙陀都督府”时，则下皆空白，既无设置时间，也无地点。因此，我以为“沙陀都督府”一称，是由于《新唐书》纂修者把“金满州”这一沙陀人都督府，误作为“金满州”和“沙陀州”两个都督府所致。

我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条重要根据，这就是《新唐书·突厥传》在谈到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后，“罢瑶池都督府，即处月置金满州”。^④ 这与《沙陀传》所说明显有所不同，

在《旧唐书》等史籍中，有“金满州都督府”，而没有“沙陀州都督府”。例如，《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载：“金满，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⑤ 这里所说的“金满”，就是指在原处月部地所置的“金满州都督

①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上》；参见《旧唐书》卷195《回鹘传》。

② 《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③ 《新唐书》卷47《地理七下》。

④ 《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

⑤ 《旧唐书》卷40《地理三》。

府”。又《资治通鉴》永徽五年（654）闰四月条：“以处月部地置金满州。”胡三省注：“其地近古轮台，属北庭都护府。”^①《新五代史·庄宗纪上》：“唐德宗时（780—805），有朱邪尽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满州。贞元（785—805）中，吐蕃赞普攻陷北庭，徙尽忠于甘州而役属之。”^②这就是说，在其他有重要影响的史籍中，都未见有设置“沙陀都督府”这一军政机构。

由此可见，所谓唐初有“沙陀都督府”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史籍中之所以有这一名称，实是撰史者疏忽所致。如果把“沙陀都督府”理解为沙陀人的都督府，似可以会通。如若说在“金满州都督府”之外，别有一个“沙陀都督府”，或一个名为“沙陀都督府”的机构，则是错误的。

二 “沙陀三部落”的形成及与沙陀族关系

关于“沙陀三部落”一词的来源，最早见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条载：“诏太原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委石雄为前锋。易定兵千人守大同军，契苾通、何朝清领沙陀、吐蕃六千骑趋天德，李思忠率回纥、党项之师屯保大栅。”^③从此以后，关于“沙陀三部落”的活动，便不绝于书。例如，《旧唐书·僖宗纪》乾符四年条就说，“幽州李可举请以本军讨沙陀三部落，从之。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李可举”，“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④

何谓“沙陀三部落”？从有关记载中可得知，是沙陀、萨葛、安庆三个部落的联合体。《资治通鉴》咸通九年（868）条在记述唐廷下令出兵镇压庞勋起义时说：“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兵以隶三帅，承训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鞞鞞、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诏许之”。胡三省注：“沙陀、萨葛、安庆分为三部。”^⑤由此可知，所谓“沙陀三部落”，即上述三部落

① 《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

② 《新五代史》卷4《庄宗纪上》。

③ 《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原书标点符号有错，作“室韦沙陀三部落”。

④ 《旧唐书》卷19《僖宗纪》。

⑤ 《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

的简称。

“沙陀三部落”，史籍有时又将其称为“代北三部落”或“代北部落”。例如，《旧五代史·康义诚传》载：“康义诚，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①也有将其称为“沙陀六州部落”的。例如，《旧唐书·僖宗纪》乾符元年条说：“以宣慰沙陀六州部落、检校兵部尚书李钧为灵武节度。”^②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这是因其居地和族属不同而得名。所谓“代北三部落”，是因为“三部落”人俱居住于代州以北的缘故。所谓“萨葛”“安庆”，是因为两部落人分别来自“萨葛府”和“安庆府”。“萨葛”，或又译为“薛葛”“索葛”，据有关学者研究，意谓“粟特”。萨葛府，据胡三省《通鉴注》载，其府治在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③“安庆府”府治史无明载。从有关记述看，约当在云、朔北部一带。所谓“沙陀六州部落”，是由于“萨葛”和“安庆”两部落先世俱为“六州粟特”人而得名。欧阳修《新五代史·庄宗纪》注因不知萨葛、安庆来源于“六州粟特”，故称“六州三部落，皆不见其名处，据《唐书》除使有此语尔”。^④“沙陀三部落”与“沙陀六州三部落”，名称虽不相同，然其义则一也。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是如何发展成“三部落”联合体的？要了解此事，须得从“六州粟特”以及沙陀突厥人内迁说起。

据记载，“粟特人”初服属突厥。唐代初年，因突厥颉利可汗为唐军击败，部众四散，有的逃奔北方的薛延陀，有的奔居西域地区，有的则相率投附于唐王朝。史载其“来降者尚十余万，诏议所宜”。“帝主彦博语，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右置定襄都督、左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⑤原属突厥的“粟特人”，则被置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以

① 《旧五代史》卷66《康义诚传》。

② 《旧唐书》卷19《僖宗纪》。

③ 《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注云：“索葛部居振武。宋白曰：安从进本贯振武索葛府索葛村。”

④ 《新五代史》卷4《庄宗纪上》。

⑤ 《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

南的鲁、丽、含、塞、依、契一带，世称之为“六胡州”^①（或“六州胡”）。贞元二年（786）十二月，以吐蕃举兵进攻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境内）、夏州等地，“六州胡”惧为所袭，便相率走石州（今山西离石市）。唐绥、银、麟、胜招讨使马燧为了使之远离战争前线，置其众于云、朔地区。此后唐廷即于其聚居区内分别设萨葛、安庆两府以治之，以其首领为都督。

在六州胡人徙入云、朔地区后不久，沙陀突厥人由于种种原因也徙入云、朔一带。前面已指出，沙陀人原居住于西域“金满州都督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地区。后因不堪回鹘贵族凌侮，举部投附吐蕃，居甘州，不时受到吐蕃的压制。元和三年（808）其首领朱邪尽忠为了摆脱吐蕃的羁绊，率众投奔唐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希朝置其众于盐州。旋以希朝受命镇河东，沙陀部众也随希朝一起往镇。时朱邪尽忠已死，希朝使尽忠子朱邪执宜率精骑1200名“沙陀军”保神武川之黄花堆，号“阴山北沙陀”，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②神武川黄花堆在今山西山阴县境内，位于云州与朔州中间。这里春秋为北狄地，战国时属赵，秦为雁门郡地方。境内不仅有可供畜牧的广阔牧场，且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河东地区的重要孔道。范希朝使朱邪执宜率沙陀劲骑驻守其地，显而易见，是想用英勇善战的“沙陀军”为之捍御边境安全。如元和八年（813）十月，回鹘遣兵渡漠南，谋自柳谷击吐蕃。^③唐朝惧其扰害，即令朱邪执宜引兵屯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以为备。次年，又以吴元济发动叛乱，使执宜率兵从李光颜前往征讨，不久即平息。长庆元年（821），镇州都兵马使王庭湊阴结牙兵哗变，执宜应召举兵前往镇压，很快取得了胜利。“沙陀军”声威从此大振。文宗大和四年（830），河东节度使柳公绰请授执宜为阴山都督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一带，得到了文宗的许诺。时其地有废栅十一座，^④执宜率众3000人前往驻守，号

① 关于“六胡州”的设置时间，史书一般都称为置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依据《全唐文·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记载，以为应在贞观初年。从有关记载看，其说法是可信的，本文取其说。

② 《新唐书》卷218《沙陀传》。“定襄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又作“定襄州”，其地当在唐忻州定襄县境内。

③ 参见（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4。

④ 废栅，一作废府。（南宋）胡三省《通鉴注》以为当作“栅”。

“代北行营”。^① 居住于代州以北的诸少数民族军队俱为其统辖。不久执宜死，子赤心继为首领。赤心英勇善战不亚于乃父，在率军与北方及西北边境的回鹘、党项、吐蕃军的战斗中，长操胜算。史载“赤心所向，虏辄披靡”。^② 由于萨葛、安庆二部与沙陀人长期居住在一起，征战在一起，且原俱属突厥，于是便使双方逐步走上了联合的道路，而朱邪赤心也由沙陀首领一跃而为“沙陀三部落”首领，世称之为“沙陀三部落使”。^③

“沙陀三部落”因是在唐末藩镇割据和战乱环境中形成的，故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其相互关系也不断有所加强。例如，在镇压庞勋起义和黄巢起义中，“三部”就一直被置于朱邪赤心父子的直接控制之下，这对于“三部落”逐步发展成为巩固的联合体并最后走上一体化道路，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沙陀三部落”是沙陀人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沙陀突厥人就无法在五代时期创造出那样辉煌的业绩。翻开新、旧《五代史》，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在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中，属于“沙陀三部落”的人，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他们大都身居要职，手握重权。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其《胡考》一文中就说：“五代诸臣出代北者多胡姓，如康福、康思立、康义诚、康延孝、安叔千、安重荣、安从进、李存孝、（李）存信、安审琦、白从进，皆是也。然则沙陀虽云突厥，其与西胡相淆，亦云甚矣。”^④ 来源于萨葛、安庆两部的胡人之所以受到如此重用，显而易见，这是沙陀首领将其视为一体的缘故。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充足的历史根据的。例如，“安叔千”，《旧五代史·安叔千传》云其“沙陀三部落之种也”。^⑤ 但《资治通鉴》在述及安叔千的族属时，则称其为“沙陀人也”。^⑥ 又如“安金全”，《旧五代史·安金全传》称其为“代北人”。^⑦ 而同书在载及其子“安审琦”时，

① 《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② 同上。

③ 参见《资治通鉴》卷253《唐纪六十七》。

④ 苏州国学会编《国学论衡》1935年12月第6期。

⑤ 《旧五代史》卷123《安叔千传》。

⑥ 《资治通鉴》卷279《后唐纪八》。

⑦ 《旧五代史》卷61《安金全传》。

则称其“先沙陀部人也”。^①由此可见，早在宋代，人们已知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了。由此也可见，史书中所说诸“胡”姓，虽然大都未言其族属，但若是来自代北一带或太原左近的，其绝大多数都应是“沙陀三部落”人。由此还可见，沙陀族人虽然来源于沙陀突厥，但二者之间已有了巨大不同，过去有些学者往往将其等同，这是不正确的。

三 沙陀族共同体中的其他民族成分

据诸书记载，沙陀族共同体中的其他民族成分有突厥、回鹘、吐谷浑、靺鞨、汉族以及党项等。

突厥。这里所说的突厥，是指除“沙陀三部落”以外，在隋唐五代一直仍被确认为突厥的人。突厥人之所以能成为沙陀族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分之一，是与大量突厥人散居于唐朝北方边境相关的。例如，在贞观初年，颉利可汗失败后，其降众就分别被置于幽州、灵州一带的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地方。咸亨年间（670—674），其部落又有相率内附的，分别被置于丰、胜、灵、夏、朔、化州等地方，从而在北方形成了许多突厥人居住区。其中虽有一部分后逃离其原来居住地，但继续内徙和滞留当地的也不在少数。例如，后唐、后晋重要将领张彦泽，其祖、父就是留居于当地者之一。《旧五代史·张彦泽传》记载：“张彦泽，其先出于突厥，后为太原人也。祖、父世为阴山府裨将。”^②这里提到的“阴山府”，就是以朱邪执宜、朱邪赤心为都督的“阴山都督府”。从以上记载中可知，张氏早在其祖、父时代就与沙陀人结合在一起了。又如郭金海，其先世也是突厥。《旧五代史·郭金海传》载：“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常从征伐。”^③后唐明宗即位后，累官至“护圣都虞候”。及石敬瑭建立后晋，又以战功受册为检校太保、商州刺史。张万进大概也是突厥人。万进在唐庄宗、明宗时，由于屡建战功，曾“累典大郡。天成、长兴中，历威胜、保大两镇节制”。^④这里所举，虽只是个别人物，但不知姓名的，则又有凡几。

① 《旧五代史》卷61《安金全传》。

② 《旧五代史》卷98《张彦泽传》。

③ 《旧五代史》卷94《郭金海传》。

④ 《旧五代史》卷88《张万进传》。

回鹘。回鹘之所以能成为其重要成分之一，与其散居于唐北方边境也有很大关系。据记载，自公元7世纪以后，回鹘就不断有人内迁于唐北方边疆居住。其中既有主动徙入的，也有被迫归降而入的。例如，《唐会要·回纥传》就载：“龙朔三年（663年）二月，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名瀚海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以北诸州为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婆闰卒，子比来栗（一作粟）代立。比来栗卒，子独解支立。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故天宝末，取骁壮以充赤水军骑士。”^①《资治通鉴》开元五年（717）条也载：并州刺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②唐开成五年（840），回鹘因统治阶级内讧，为黠戛斯所破，国亡，此后又有为数颇多的回鹘人入居于中原内地。例如，当乌介可汗于天德战役中失败后，其特勤唃没斯、阿历支、习勿噶率众降唐朝，被置于云、朔之间。^③由于他们与沙陀人居地相近，加上沙陀首领长期担任代北一带防御任务，故随着岁月的流逝，有部分人便逐步融合于其中。例如，李克用义子李存信，先世就是随回鹘唃没斯（李思忠）内附的，住于云中合罗川。史载存信因“通黠多数，会四夷语，别六蕃书，善战识兵势”，^④深得李克用之父及其本人的赏识，曾为沙陀族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又如何建，先世也是回鹘人，“居云、朔间”。祖庆、父怀福，俱事后唐李克用。他本人自年轻时则侍奉石敬瑭，“以掌厩为役”。及石敬瑭称帝，遂“累典禁军，遥领欢、睦二郡”，“累官至检校太傅”。^⑤此外，如杨彦珣、侯三、贺回鹘等，先世也俱为回鹘人。

吐谷浑。吐谷浑与沙陀人相结合，并融入其共同体中，估计数量也很多。因为在咸通年间（860—874）朱邪赤心（李国昌）充当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招讨使时，其属下就已有不少吐谷浑人在其军中服役了。^⑥此后云中地区吐谷浑部首领赫连铎、白义诚因在与李国昌父子争夺云、代地

① 《唐会要》卷98《回纥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九姓”，即“回鹘”。

③ 参见《新唐书》卷217《回鹘下》。

④ 《旧五代史》卷53《李存信传》。

⑤ 《旧五代史》卷94《何建传》。

⑥ 参见《旧唐书》卷19《僖宗纪》。

区战争中失败，赫连铎被杀，白义诚被俘，其部众就有不少为李国昌父子并入“沙陀军”中了。例如，李克用义子李嗣恩，原来就是吐谷浑人。《新五代史·李嗣恩传》载：“嗣恩，本姓骆，吐谷浑人也。少事太祖，能骑射，为铁林军将稍以战功迁突阵指挥使，赐姓名，以为子。”^①后唐明宗李嗣源养子李金全也出身于吐谷浑。《新五代史·李金全传》：“李金全，其先世出身于吐谷浑，以骁勇善骑射，常从明宗征伐，以功为刺史。”^②此外，如慕容彦超、白从晖、白承福等也皆吐谷浑人。在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中，俱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鞑靼。这里所说的鞑靼，主要是指“阴山鞑靼”。“阴山鞑靼”，史籍或又称为“阴山室韦”。有关“阴山鞑靼”来源，学术界目前尚有不同说法。不过此事与本文关系不大，此不赘述。“阴山鞑靼”在唐中叶以后，曾广泛活跃于阴山至云州边境一带，与沙陀、吐谷浑、党项等毗连而居。《旧唐书·范希朝传》载：“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俱骇，鲜有宁日。”^③鞑靼人虽然不时遣众扰害唐边，但政治日趋衰败的唐王朝，却仍经常利用其力量从事征战。例如，武宗会昌二年（842），当回鹘乌介可汗挟太和公主进攻云州等地时，武宗便令“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前往堵御。^④又如咸通九年（868），以庞勋发动起义，引兵北上，驻次彭城（今江苏徐州），唐懿宗便令康承训率沙陀三部落、鞑靼和吐谷浑前往镇压。^⑤鉴于鞑靼人和沙陀人经常在一起征战，遂使双方往来日渐密切。广明元年（880），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因在与赫连铎等争战中失利，被迫逸入鞑靼部。不久，黄巢率领起义军占领长安，李克用受命前往征讨，便于当地率“鞑靼部万人”，^⑥与先期聚集于忻、代、蔚、朔等地军队会合进攻长安。这些鞑靼军队从此即成了“沙陀军”的一部分。后唐建立前夕，其军队就有不少鞑靼人在为其服役。《旧五代史·庄宗纪》天佑十三年条载：“秋八月辛丑朔，大阅于郊，河东、魏博、幽、沧、镇

① 《新五代史》卷36《李嗣恩传》。

② 《新五代史》卷48《李金全传》。

③ 《旧唐书》卷151《范希朝传》。

④ 《旧唐书》卷18《武宗纪》。

⑤ 参见《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

⑥ 《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上》。

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① 这里所说的“室韦”，显然即是鞑靼的异称。文中还提到军中有奚和契丹人，但估计不会太多，可能是从辽朝中逸出的。

汉族人。在沙陀族共同体中，汉族人估计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里所说的汉族人，主要是指那些被吸收入“沙陀军”中并已基本“沙陀化”的汉人。例如，李克用的义儿队中，李存审、李嗣昭、李存璋、李存贤等，就可能来自汉族。至于不知姓名的人，肯定就更多了。在后唐、后晋、后汉的后妃中，也有很多汉族人。例如，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妃韩氏、伊氏、明宗皇后魏氏、妃王氏，愍帝皇后孔氏，后晋出帝皇后冯氏，后汉高祖皇后李氏等就是具体例证。

从有关记载看，大概还有党项人。但我们在五代史籍中，至今还没有找到足资证明的重要实例。

四 沙陀族的族姓

关于沙陀族姓，以往学术界只把后唐皇帝李氏、后晋皇帝石氏以及后汉、北汉皇帝刘氏作为沙陀族姓，称为“沙陀三族姓”，而对于其他诸姓氏则视而不见。这种看法是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认真查阅一下史籍，不难发现，可正式确认为沙陀姓氏的，至少有十余姓。

“李”姓。李姓是沙陀突厥首领朱邪氏（一作“朱耶氏”）的赐姓。其得姓是咸通十年（869）唐懿宗颁给朱邪赤心的，以表彰其在与庞勋起义军战斗中所立下的“战功”。《资治通鉴》咸通十年条载：“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李国昌，赏赉甚厚。”^② 从此以后，朱邪族裔皆改姓李。李姓除朱邪氏家族外，李克用的义子们也大多数姓李，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孝、李存璋、李存贤等就是这样。其中有回鹘、吐谷浑、突厥、六州粟特人。此外，还有汉人，数量也很多。李姓既是贵姓，又是著姓。

① 《旧五代史》卷28《庄宗纪二》。

② 《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旧唐书·懿宗纪》则将赐姓载在咸通十一年。

“安”姓。“安”姓意谓先世为“安国人”。“安”姓在沙陀共同体中也是著姓。在五代时期以“安”姓享名于世者很多，如安重荣、安重海、安重霸、安元信、安彦威、安叔千、安金全、安从进等都是其重要代表。例如，《旧五代史·安叔千传》载：“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也。父怀盛，事唐武皇，以骁勇闻。叔千习骑射，从庄宗定河南，为奉安部将。天成初，王师伐定州，命为先锋都指挥使。”^①又如安从进，史载其为“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为骑将。从进初从庄宗于兵间，为护驾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②“索葛”，前已指出，即为萨葛异译。这就是说，安从进也来自沙陀三部落。除以上二人外，其余诸人虽没有明确指出其为“沙陀三部落”，但从来自“代北”“马邑”“云州”等记载看，便可知其为“三部落人”即“沙陀人”无疑。

“康”姓。“康”，意谓先世为“康国人”。在沙陀族共同体中，“康”也是著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康思立、康义诚、康福、康延孝等人。康思立，《旧五代史》称其为“晋阳人”，而《新五代史》则称其为“山阴（今山西山阴县）人”。^③无论是“晋阳”或是“山阴”，都足以说明他是沙陀人。因这两处地方都是沙陀人的重要聚居区。康义诚史载其“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骑射事晋王（李克用），庄宗时为突骑指挥使”。“明宗即位，迁捧圣指挥使，领汾州刺史”，累迁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复为新军都指挥使等职”。^④康福，来自“蔚州”，“世为本州军校，祖嗣，蕃汉都知兵马使，累迁太子太师”，“福便弓马，少事唐武皇（李克用），累补军职，充承天军都监”。^⑤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隶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后唐同光初年返回后唐，“以为捧日军使兼南面招讨指挥使、检校司空、守博州刺史”等职。^⑥毫无疑问，他们原来也都是“三部落”人。

“史”姓，意谓先世为“史国人”。在新、旧《五代史》中，声名卓著的史姓人物也很多，如史敬存、史建瑋、史俨、史敬镕、史匡翰等都是

① 《旧五代史》卷123《安叔千传》。

② 《新五代史》卷51《安从进传》。

③ 《旧五代史》卷70《康思立传》；《新五代史》卷27《康思立传》。

④ 《新五代史》卷27《康义诚传》；参见《旧五代史》卷66《康义诚传》。

⑤ 《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参见《新五代史》卷46《康福传》。

⑥ 《旧五代史》卷74《康延孝传》。